军史发现

我所知道的《新四军军歌》诞生历程

■袁振威

口述·军史

还原历史的本真

《新四军军歌》是我最爱唱也是我唱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因为我是听着老前辈讲述《新四军军歌》的故事长大的。我父亲袁国平，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我母亲邱一涵在新四军皖南时期任教导总队宣教科长，《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所在的文化队又隶属于教导总队，因此她对《新四军军歌》的创作过程是十分清楚的。陈毅等前辈以及时任军部速记班班长的李又兰、《抗敌报》副主编马宁有关对军歌的讲述，不仅让我认识了军歌，同时也让我了解了许多《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历史，更让我爱上了《新四军军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包括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联名颁布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等历史文献，完全吻合了前辈们关于《新四军军歌》创作背景及创作过程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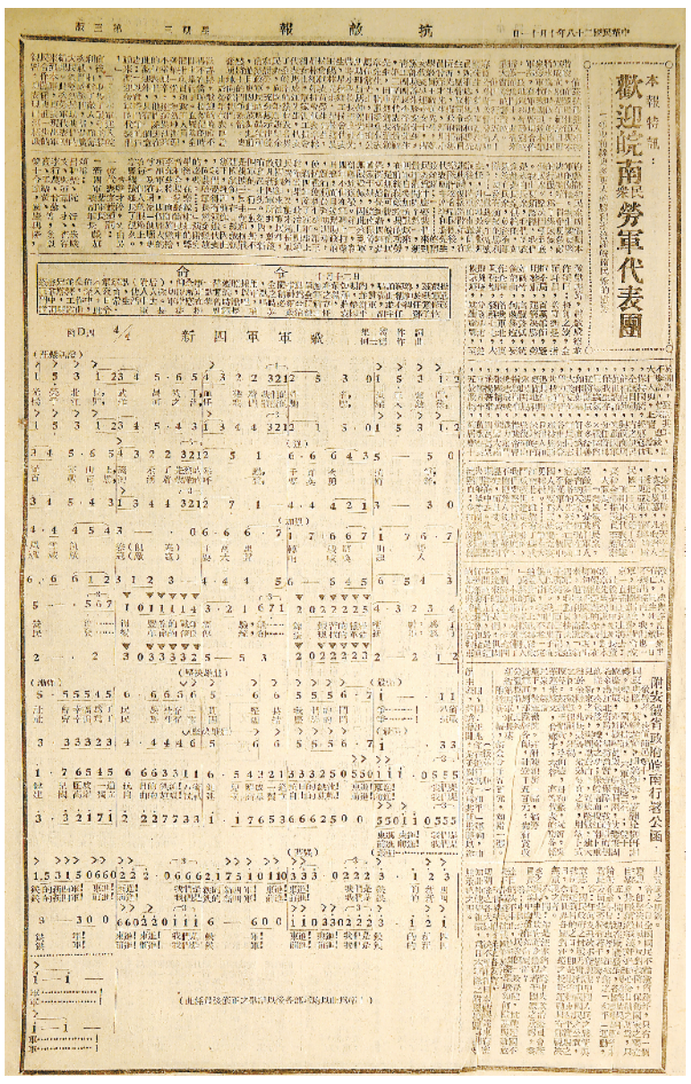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就曾亲口对我说："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他主持创作的。"

袁国平受命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大家都非常兴奋。

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成。项英当即表示："叶军长的意见很好，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前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就在军部征集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职，军歌的创作由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

接着，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第三，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能催人奋进勇往直前。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军歌。"袁国平表示，创作军歌是政治部分内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但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请各位指导。陈毅讲，我正在写一首诗，待完成后可供你参考。项英则说，我给中央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你也可以看看。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抗敌报》刊登的颁布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及歌谱。

在炮火硝烟中诞生

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年》的撰写。4月上旬，袁国平收到陈毅的诗并附有一封信。信中说，"我因在军部滞留的时间较长，积压许多军务急需处理，又要忙于传达周副主席和军部的指示，为军歌作词之事只能作罢。现将诗稿寄来以供参考。"袁国平即责成朱镜我考虑是否可将《十年》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马宁还说《十年》是叙事诗，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很难改成歌词。

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马宁、朱克靖和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以外，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完全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遂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来稿的可取之处，做了进一步修改后，决定将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同时交何士德谱曲。

陈毅收到军歌歌词征求意见稿后，在给军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

征求意见稿返回军部后，在政治部讨论时，政治部秘书长黄诚觉得"镌刻"更为深刻些，因为自北伐以来，国民党中的将领常抹煞共产党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功绩，而"镌刻"的寓意彰显了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功绩是彪炳史册的。而袁国平则认为革命战争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他觉得陈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镌刻"改为"血染"也是可取的。针对不同的意见，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将"镌刻"二字改成"血染"。

袁国平在组织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谱好曲。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他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这一稿没有马上递交审查，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新四军指战员大都出身工农，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后，使得曲调更加雄壮有力、鼓舞人心，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曲与词的结合也相当完美，使得歌词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现。结尾处，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1939年7月1日中午，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了《新四军军歌》。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项英当即叫"好"，并说："你们唱得好，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然后，袁国平当即代表军部郑重宣布："通过！"并将军歌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日寇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

警报解除后，项英和袁国平在大家面前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愤怒地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一笔血债。我们要用各种战斗来回击敌人，大家要到部队去教唱军歌，用革命的歌声激励士气，打击敌人。"然后，他宣布当晚庆祝"七一"的晚会暂停，要求大家到云岭去救灾。

袁国平在讲话中说，《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

弹痕累累，硝烟未散，在项英、袁国平的一番义愤填膺的讲话以后，大家带着满腔怒火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再次高唱军歌。所以，《新四军军歌》名副其实是在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

颁布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

新四军军部首长对《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和学唱非常重视。在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即1939年10月12日之际，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联名签署命令，在正式公布《新四军军歌》的同时，强调以军歌为教材对全军指战员进行党史、军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命令全文如下：

命令

兹审定并公布本军军歌（附后），仰全军一律遵照采用，全体指战员应在最短期内，唱诵纯熟，兹根据军歌解释，深入教育，使人人深切了解军歌意义，以军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并贯彻此精神於我军战斗中，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去。军歌应在集会时歌唱，唱时必须全体肃立，庄严郑重，并不得任意修改歌词与歌曲，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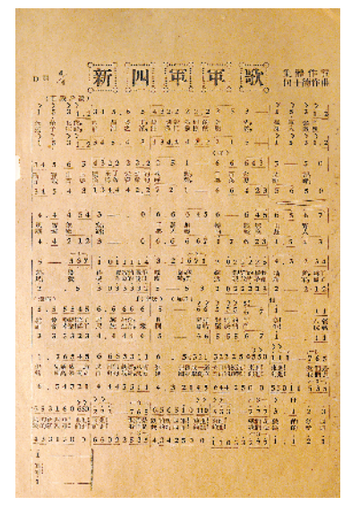
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主任邓子恢

命令所附《新四军军歌》在注解中明确指出"此系最后修正之歌谱，以后各部队均以此为准"，命令还特别强调"不得任意修改歌词与歌曲。"这为统一军歌的词曲，提供了最准确最可靠的标准，也为确保《新四军军歌》不被演变，规定了铁的纪律。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新四军军歌》就这样以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或作曲转载在诸多刊物上，传唱中华大地，经久不衰。

军歌歌词被史沫特莱译成英文传到国外

当年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传到了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史沫特莱在奔赴北京途经英国时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托朋友将她的歌词手稿等遗物一起寄给了她曾采访过的朱德总司令。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当即指定由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开国大典前赶制的编号为"大中华唱片厂38254"的唱片很快报送北京，其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另一面即是《新四军军歌》，这张唱片仅制作10张，可见《新四军军歌》在当代革命歌曲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1939年6月15日《抗敌》杂志第4号刊登的《新四军军歌》。

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在《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一文中就袁国平对《新四军军歌》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他积极组织《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加强了战斗气势，使之成为一首雄壮有力、脍炙人口的著名军歌。"

如今，袁国平和他的战友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精心创作的这首《新四军军歌》，鼓舞了几代人顽强奋进。这气势磅礴的雄伟战歌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产生于一群信念坚定、才华横溢的中华精英。他们人已离去，歌声却始终响彻在祖国大地，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代代相传！

谨以此文纪念《新四军军歌》诞生八十周年。

长征

第4670期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八子参军与瑞金扩红运动

■曹春荣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拍摄的革命战争题材献礼影片《八子》，今年下半年在全国上映。这部以当年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一户农家八个儿子参加红军最后全部牺牲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影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瑞金当时轰轰烈烈的扩大红军运动。

1933年2月8日，正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处于最紧张之时，中共中央局提出了在全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任务。从此，中央苏区不断掀起扩大红军高潮，形成波澜壮阔的扩红运动。瑞金作为赤色首都、中央直属县，在历次扩红中都走在各地前面，成为扩红模范县。瑞金广大劳苦群众以"踊跃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为光荣，互相竞赛、互相激励。妇女们唱起《送郎当红军》《十送郎》等红色歌谣，手捧鞋帽手巾等慰劳品，动员鼓励男子当红军。放学回家的少年儿童有组织地沿途高呼口号："大家当红军去！"党、团员们在扩红运动大会上振臂高呼："大家跟我一起去报名当红军！"一时间，瑞金城乡到处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景象。

献礼影片《八子》海报。

在1933年的红五月扩红冲锋月中，云集区坪山乡妇女曾来英、谢来发娣、谢玉英三人，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当红军，还带动了本村14名年轻人参加红军。桃阳区山崇乡李贤胜三兄弟，黄安区梅岗乡洪先滨、洪先浪、洪先彩、洪先全四兄弟，分别同时加入红军，被传为佳话。下肖区七堡乡党支部、黄柏区大柏地乡党支部，都是整个支部加入红军。短期内，瑞金就集中了4500多人入伍，组建了瑞金模范师。7月，瑞金又扩红1953人，成为红军工人师（又名中央警卫师）的主体之一，为第一个"八一"建军节献上了一份厚礼。瑞金模范师和红军工人师成立后，分别编入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先后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和湘江战役等重大战事，绝大多数人壮烈牺牲，许多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余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而保卫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仅有10万余人，加上各地群众武装5万余人，还不及敌方兵力的三分之一，况且我方的武器装备等还远远落后于敌人。这样，红军不能不迅速扩大兵员以应对。为此，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首次从中央一级机关中抽调得力干部组织突击队，下沉各省各县，帮助各地为完成12月底前中央苏区扩大新战士2.5万名的任务而努力。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给中央级机关以及省级机关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

当年11月底，前往瑞金协助扩红的由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干部组成的突击队，就和瑞金县69名干部组成15个突击分队，出发各区扩红了。到12月31日，全县送到补充师的新战士达1814名，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扩红任务。

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迅速扩大红军遂成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决定了1934年5、6、7三个月扩大红军5万的计划。其中，5月被称为"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扩红2.7万名新战士的任务。担任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领受了瑞金三个月扩红2000名的任务。他们和瑞金的干部群众一齐努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的扩红任务。到5月27日，全县集中了新战士3200余名；到6月2日召开瑞金县"红五月"扩红总结会时，这一成绩更上升到扩红新战士5200余名。因此，出席总结会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代表中革军委授予瑞金模范县奖旗，上书"三月计划一月超过！"

金维映在总结瑞金"红五月"扩红突击经验时，特别肯定了突击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在如此火热的氛围下，瑞金全县再次涌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景象。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户农民，一家有八个兄弟。在红五月扩红动员中，八兄弟中有一个报了名当红军。当他兴冲冲地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说与邻居听时，没想到邻居冷淡地回应道："你们八兄弟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稀奇。"邻居的反应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想起本村和周围村落一家几兄弟或先后或同时去当红军的事例，想起突击队的宣传，土地革命带给他们的好处……情急之下，他找来父亲和七兄弟，商量接下来怎么办。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八兄弟全体报名当红军。很快，他们就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在下肖区杉山乡的扩红突击运动中，还出现了四位女英雄，分别是妇女指导员梁秀英、副指导员梁发英，还有两个姓名不详的妇女代表。她们不仅自己报名加入了红军，而且每人都领导了一班赤色少先队员加入红军。

在扩红突击会上，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长汤保康、副部长邹汝南、军事部长朱学禹、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少先队瑞金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一科科长郭世松以及中共中央局实习生谢玉昆，率先报名当红军，并向全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人和农民发出倡议："武装起来，和我们肩并肩到前线去杀敌！"他们的模范行为带动了众多青年参加红军。

1934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再次下达中央苏区扩红3万的计划。瑞金又一马当先，从9月1日到9日仅用9天时间就完成了原来一个月2500名的扩红任务。至13日，瑞金输送到红军主力部队的新战士多达3365人，另外还动员了280人到独立营，组织了4000名民伕供给红军部队。

苏区时期，瑞金全县只有24万人，加入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就有5万人。红军长征时，瑞金有约3.5万人参加这一壮举，其中约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新中国成立后，被录入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烈士花名册的本县籍烈士仅17166名，许多人成了无名烈士。但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初心：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3年《红色中华报》刊登的纪念红军成立日的漫画《整师整师的加入到红军中去》。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00分　印完4时20分